



宗密之傳記及其著作

幻生

(續上期)

以上，就圓覺經大疏鈔所記，從長慶元年至長慶三年的不同記載，共有二處：一、長慶元年正月，宗密回到終南山草堂寺靜修，從長慶二年春至長慶三年夏，重治圓覺經科文及圓覺經纂要；二、他在終南山豐德寺，長慶二年，著華嚴綸貫五卷，長慶三年，著四分律疏三卷。宋代觀復，在其「圓覺經鈔辨疑誤」卷上，提出疑問(註③)。觀復指摘：一方面說，長慶二年在豐德寺，著華嚴綸貫，而在其他地方又說，長慶元年在草堂寺，絕跡息緣；長慶二年重治圓覺經疏，這說明了場所不同；從長慶二年春至長慶三年夏，修完了圓覺經疏，而他處又說，三年秋冬修疏，這顯示了時間的不同。簡單地說，大疏鈔所記，呈現着「場所」與「時間」的二種矛盾。對於這個問題，元代清遠在其「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」，代為辯說：「今謂草堂、豐德同在一山，有何不可？所叙年月，但言大概。豈得畧不從容，專於一邪？」(B)續，一五，二七〇，B)大體而言，草堂寺與豐德寺，均同在終南山上，而宗密在終南山著述，爲了閱讀參考資料的方便，可能草堂寺與豐德寺，都是常來常往的。大疏鈔中所記不同，不能視爲不思議的事。至於長慶三年夏，或三年秋冬的月分不同，這應該視宗密自己對成書的時間而定。在此應該注意的，大疏鈔中有一段說明：「至三年秋冬，方得終畢。言諸論者，起信、唯識、寶性、佛性、中觀、諸攝(攝大乘論自有數本)、智度、瑜伽也。」(B)續，一四，二二六，B)綜觀大疏鈔前後所記，其情形可能如此：長慶三年夏，宗密重治圓覺經科文及圓覺經纂要二書初稿完成，其後再參考諸經諸論，對其初稿有所修改，直到秋冬之際，全部始予修訂成功，成爲重治之定本。所以，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對此事之記述，才有「夏」與「秋」「冬」等時間之差異。

此外，宗密爲圓覺經所著各種疏鈔，究竟是在何時寫成的？他的自傳與其他傳記裏，都沒有明確的記載。不過，圓覺經大疏鈔中有如下的記述，我們應該注意：「至三年秋冬，方得終畢。……以利器者，……此明欲造圓覺疏。故十數年來，先習教，以利其智方製。」(B)續，一四，二二六，B|C)根據這段文字來看，宗密發願爲圓覺經著注疏，十數年來，先做基本工作，研習諸經。長慶三年，宗密四十四歲。所謂十數年來，大抵指他二十八歲出家以後，至四十四歲的十多年中，廣泛地研究佛法期間，由此，可以見出宗密爲注釋圓覺經之前的一段準備時期之大要了。五祖畧記所記，長慶三年冬初，宗密著圓覺經大疏三卷，圓覺經大疏鈔十三卷。至於圓覺經畧疏一卷，圓覺經畧疏鈔四卷，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十八卷，撰於何年，便無明文可知了。

圓覺經與宗密有着特殊的因緣關係。宗密出家後的前半時期，他的精力與時間，大半都用在圓覺經上。長慶三年，他在終南山豐德寺，不僅爲著圓覺經註釋而忙，同時也時時留意圓覺經的本子與注疏。圓覺經大疏鈔卷四，他有一段記述：「余又於豐德寺雜經中，見一本圓覺經，年多虫食，悉已破爛，經末兩三紙，纔可識辨。」(B)續，一四，二八二，B)宗密在終南山探索羣經之際，偶得圓覺經殘本，仍然不肯放過，其對圓覺經的熱情可知。他出家爲沙彌時，在府吏任灌家中見到圓覺經，現在終南山又見到圓覺經殘本，這顯示長安與四川都有圓覺經的存在。

元和十四年(八一九)以後，宗密爲了配合研究圓覺經的關係，兼帶研究唯識，並寫成「唯識論疏」等。同時，他也從事金剛經與肇論的研究，結果又陸續地寫成「金剛經疏論纂要」一卷，「金剛經疏鈔」一卷，以及「大雲經疏」、「肇論注疏」等。長慶元年(八二一)，宗密四十二歲，回到終南山草堂寺。

除了圓覺經大疏鈔等所記述之外，他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也說：「而自慮愛見難防，遂捨衆入山，習定均慧，前後息慮相計十年。（云前後者，中間被勒迫入內，住城三年（按：麗本作二年），方却表請歸山也）」（大正，四八，三九九，下）所謂「捨衆入山」，即指長慶元年正月回終南山草堂寺之事。「前後息慮相計十年」，乃指文宗太和二年至太和三年，宗密被召入內，除此二年之外，從長慶元長至太和七年，前後相計共有十年，他隱棲在終南山草堂寺。宗密在這隱棲的十年中，也是其思想上的一大轉機，他除了廣泛研讀一切經論之外，並完成了他對圓覺經等許多精心的著作。

太和二年，（八二八）的慶成節，他被文宗召入宮內，賜紫方袍，受大德之號，一直在城內居住。直到太和四年，他才上表請回草堂寺。在此前後，他應裴休之請求，著「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」。太和七年（八三三）以後，他著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，說明當時禪宗各派的主張，同時，並倡導教禪一致說的思想。在太和年間，爲宗密聲譽到達最高的時代。他身爲政僧，與當時的政治人物交遊，獲得皇室的禮敬。景德傳燈錄說，對宗密說教而提質問的人，僅舉裴休、蕭相公（蕭俛）、史山人、溫造尚書（註④）四人之名。其中史山人的歷史不明。至於裴休等人，均係名門出身，爲當時的政治權力人物，宗密獲得他們的敬重與支持，其聲譽之隆，可想而知。

不過，還有一事，在宗密的自傳裏沒有提及，而爲宋高僧傳等所記載的，便是文宗太和九年（八三五）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發出的甘露之變。策劃甘露之變的領導人物，爲宰相李訓與鄭注，李訓便是宗密平日交遊最密切的人物之一。甘露之變的目的，是在誅除宦官仇仕良等人，但事機不密，爲其發現，帶領禁兵反擊，李訓逃往終南山依投宗密。宗密不顧寺象反對，欲爲之剃髮出家，藏匿於寺。事爲李訓從者所阻，後來改變計劃，奔往鳳翔。此爲通鑑、舊唐書、宋高僧傳所載。舊唐書卷一一九，李訓的傳記有如下記述：

是日訓中拳而仆，知事不濟，乃單騎走入終南山，投寺

僧宗密。訓與密素善，欲剃其髮匿之。從者止之，乃趨鳳翔，欲依鄭注。……仇仕良以宗密容李訓，遣人縛入左軍，責以不告之罪，將殺之。宗密怡然曰：貧僧識訓年深，亦知反叛。然本師之法，遇苦即救，不愛身命，死固甘心。中尉魚弘志嘉之，奏釋其罪。

「興隆佛教編年通論」卷二十五，對此事也加以讚嘆說：

論曰：太和末宰相李訓、鄭注，謀誅宦官，不克。事敗，訓走終南山，依密禪師。其徒懼禍不內，密獨保庇之。事急，訓奔鳳翔，爲羅卒所獲。宦官仇仕良，以密匿訓，迫至將殺之。密怡然曰：「與訓游久，吾法遇難即救，死固其分也。」

「仕良壯其不撓而釋之。唐史書此，蓋美其有大節也。密具微法眼，達佛知見，以廣大無礙辯才，闡釋宗教，功力具備。一旦遇死生不測之際，能自信道若此。昔韓退之文章，未必遇柳子厚，其後世所以推先者，特宣撫王廷湊一節勝耳。若圭峯史氏所書，乃萬行中之一行焉。尙爾焜耀竹帛，矧其開鑿人天，紹隆法道，稱菩薩人，不亦宜乎哉？然則吾祖所謂明佛心宗，行解相應圭峯是矣！」（凡續，一三〇，三三七，A——B）

又，「指月錄」卷六，對宗密此種獨特超然的态度，也表示讚佩說：「予謂：比丘與唐士大夫交者多，或見傳記，多犯法辱教，而圭峯獨超然如此，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，蓋其履踐之明也。」（凡續，一四三，D）

在世俗政治人物中，與宗密交遊相知最深的，當爲裴休。裴休出生於河南省濟源縣官僚貴族之家的進士。晝以講經，夜以賦詩爲日課。家中世代信佛，其本人亦皈依佛教，學養很深。大中六年（八五二）爲同平章事，在位五年，作運漕法與稅茶法等新法。咸通初（八六〇年頃），七十四歲卒。裴休不僅與宗密有很深關係，其與清涼澄觀、黃蘗希運、大達端甫等人，也有交往，此三僧之碑文，亦爲裴休所撰（見「全唐文」卷七四三）。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宗密寂後，他與繼承洪州宗傳統的黃蘗有深交。此外，馬祖道一、潯山靈祐、東京圓紹等禪僧，裴休也與之交往。

裴休與宗密之關係，不只爲其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及「圓覺經大疏」等作序，宗密滅後，他並且恭撰「圭峯禪師碑銘並序」。他對宗密標榜「教禪一致」與「諸宗融會」的佛教構想，也給予很高的評價。贊寧在其「宋高僧傳」宗密傳中說：「影待形起，響隨聲來。有宗密公，則有裴國相，非國相曷能知密公！」（大正，五〇，七四三，上）誠哉斯言。這也正如裴休在碑銘并序中說：「休與大師，於法爲昆仲，於義爲交友，於恩爲善知識，於教爲內外護，故得詳而叙之，他人則不詳。」由此足見二人之間關係情誼之深厚。

四、宗密之示寂 文宗開成四年（八三九），華嚴宗第四祖清涼澄觀——宗密華嚴學之師，以一百零二歲之高龄示寂。過了二年，在唐武宗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，正月六日，宗密也在福興院坐化。正月二十二日，由道俗等將其全身奉往圭峯山，二月十三日荼毘，得舍利數十粒，藏於石室中。

關於宗密的示寂之年，史傳中所記畧有出入，碑銘、宋高僧傳、景德傳燈、五祖畧記等，均作會昌元年正月六日說，鎌田博士在其書中，舉「佛祖歷代通載」卷二十二作開成四年正月六日說：「佛祖統紀」卷二九及四二，作開成五年（八四〇）說。我在大正藏中查勘其原文，「佛祖歷代通載」卷十六所記，誠如鎌田博士所說，作開成四年說，唯卷數不是在二十二卷。「佛祖統紀」卷二十九，在宗密傳記下所記：「會昌元年正月六，坐亡於福興塔院。」（大正，四九，二九三，下）又，卷四十二所記：「（開成）五年正月，圭峯禪師宗密亡，宰相裴休撰碑。」（大正，四九，三八五，下）佛祖統紀前後所記年代不一，相差一年，與鎌田博士所說，均作五年之說，也不一致。這可能爲鎌田博士一時疏誤所致。佛祖統紀與佛祖歷代通載，成書於宋元之時，均屬後出之史傳。宗密最早的傳記，爲裴休所作之碑銘，以碑銘等所記會昌元年之說，大概是更正確的信史。

如上所說，宗密的一生，其思想形成的關鍵，有如下幾點：

①少年時代學儒學；②讀圓覺經；③師事道圓禪師等學禪；④從澄觀受華嚴哲學。宗密少年時代居家學儒學，攻讀儒家與道家的

典籍，成爲他後來著作「華嚴原人論」的學問基礎。他以佛教思想爲主體，來批判綜合儒家的思想理論。他初讀圓覺經時，由於特殊的慧解領悟，激發他從事圓覺經研究的思想端緒，其後，他以自己所學所知的全部佛教法義。配合圓覺經的思想闡述，完成了「圓覺經大疏鈔」等偉大思想著作。他最初從道圓禪師學荷澤宗宗義，不僅對禪宗各派宗旨有着正確的理解，同時，他並且寫作當時禪宗各派——北宗、牛頭宗、洪州宗、荷澤宗的歷史與教說，成爲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一書。他從澄觀受華嚴哲學，以華嚴思想法義爲主，形成他綜合統一佛教學的方法基礎，完成兼容並蓄全收全揀的理論任務。由於這許多因緣，宗密在中唐佛教界中，留下許多著作；他的教禪一致說的思想，在中唐佛教思想上，也發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解

③ 『圓覺經鈔辨疑誤』卷上說：「則知，此時正在草堂寺度夏。豈有身在草堂寺造疏，同時又在豐德寺聽四分，故作提挈等耶？況二年三年，皆在豐德寺，爲造疏之資。又二年三年，皆在草堂寺正造疏，不審何得自叙年月及所居處，如是相違耶？此不可和會者，但疑之而已。」（**卍**續，一五，二三〇，**B**）又，此書序文也說：「然此鈔多疑者，以於大疏鈔畧出時，非圭峯一手，乃弟子輩，同抄畧之，致與大疏鈔前後不相照也。抑又傳寫脫落刊版添改。」（**卍**續，一五，二二八，**A**）

④ 『林間錄』卷上說：「唐溫尚書造嘗問圭峯禪師：悟理息妄之人，不復結業，一期壽終之後，靈性何依？密以書答之曰：一切衆生，無不具覺靈空寂，與佛無殊。但以無始劫來，未曾了悟，妄執身爲我相，故生愛惡等情。隨情造業，隨業受報，生老病死，長劫輪回。然身中覺性，未嘗生死。如夢被驅使，身本安閑；如水作冰，而濕性不異。若能悟此意，即是法身。本自無生，作有倚託？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。然多生習妄，執以性成，喜怒哀樂，微細流注；真理雖然顯達，此情難以卒除。」（**卍**續，一四八，三〇六，**D**；全唐文卷九二〇）